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檢視「中國崛起」的論述及其限制

Rethinking Discourses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Limitations

doi:10.6752/JCS.200903_(8).0003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 蔡宏政(Hung-Jeng Tsai)

頁數/Page： 101-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Rethinking Discourses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Limitations

Hung-Jeng Tsai

檢視「中國崛起」的論述及其限制

蔡宏政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的修改建議，使本文的論點更加一致，也讓「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世界體系分析論點與批評得以在台灣出現。當然，文中謬誤之處，自應由作者負責。本文為國科會個人計畫「『中國崛起』的長征之路——外部整合與內部改革」(NSC97-2410-H-343-009-MY2)獎助的部分成果，在此一併致謝。

蔡宏政，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hjtsai@mail.nhu.edu.tw

摘要

從1992年之後，中國的GDP除了持續1980年代以來的增長外，國外直接投資如坐直昇機般的上升，貿易順差與外匯也相應地快速增長，這四類數據的高速成長引發了關於「中國崛起」的熱切討論。右派與左派對此議題的解釋雖然不同，卻同樣有著各自的東方主義式盲點，因而無法正面分析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對美國為主的全球市場之依賴。造成這種依賴的原因是中國的外資主要是來自四小龍（特別是台灣與香港），因此1990年代後中國的「與世界接軌」其實是日益深入地改變中國原先「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而被納入了雁飛型體系中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也因此依賴於「美元循環」下的全球經濟體制。然而，由於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它的持續增長是不能建立在依賴世界市場的基礎之上，而必須依賴國內的消費能力。然而在缺乏全國性社會安全制度的情況下，依賴市場邏輯來分配福利的「改革開放」只會更加制約了占人口多數的農民與城市職工之消費能力。要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必須將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大地分配到低所得的農民與城市勞工手中，同時也必須加快全國性的社會安全網的建置，這些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深水區因此構成了中國是否崛起的關鍵變數。

關鍵詞：中國崛起、雁飛型體系、朝貢體系、全球化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turns into a hot issue along with China's rapid growth of GDP, FDI, trade surplus and foreign reserve. The rightists explain China rise as the outcom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while the leftists interpret it as historical return of a Sino-centric tributary syste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oth right and left perspectives have their orientalist blind spots in deciphering the phenomena of China rise. These blind spots prevent them from seeing China's high dependency on the U.S.-centered global market, a main character of East Asian flying geese pattern. However, due to its big size, China's continuous growth as a key condition for the rise of China has to rely on its domestic purchasing power rather than global market. As internal purchasing power is currently constrained by income inequality and lack of well-established welfare system, corresponding social reforms thus become crucial factors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rise.

Keywords: rise of China, flying geese system, tributary system, globalization

一、前言

在支持「中國崛起」這個議題上，各類學術著作、研究報告、乃至於雜誌報刊最常引用的證據大概不外乎是底下四類數據的驚人成長（表1）。首先是GDP的變化，如果我們以改革開放前夕（1978年）為基準年的話，那麼到了2006年時，GDP已經增長到幾乎58倍。其次，更令人吃驚的是貿易開放程度（貿易量占GDP的增長），從1978年不到10%的程度上升到2006年的66.85%，2004年還幾乎達到七成，對比於美國這個宣稱最尊重自由市場的開放程度（約兩成），這毋寧是十分不尋常的事。第三，國外直接投資(FDI)從1992年之後以火箭上升般的速度增長，2006年的數量幾乎是1985年的42倍。事實上，根據聯合國的資料來計算，在全球化口號最盛行的最近10年(1994-2004)之間，中國所吸收的FDI達到所有流入開發中國家總額的四到五成。最後，鉅額貿易順差與FDI的流入造成外匯存底的驚人成長。最新的中國統計數據（表1）顯示，2006年已經獨步全球，突破一兆美元，2008年底據稱已超過兩兆美元。

表1：中國經濟成長指標，1978-2006年

年期	國外直接投資 (億美元)	貿易/GDP (%)	外匯存底 (億美元)	GDP的成長 (1978=100)
1978	-	0.0980	1.67	100.0
1979	-	-	8.40	111.5
1980	-	0.1262	-12.96	124.7
1981	-	-	27.08	134.2
1982	-	-	69.86	146.0
1983	-	-	89.01	163.6
1984	-	-	82.20	197.7
1985	16.58	0.2305	26.44	247.3
1986	-	-	20.72	281.9
1987	-	-	29.23	330.8
1988	-	-	33.72	412.7

1989	33.92	0.2458	55.50	466.2
1990	34.87	0.2998	110.93	512.1
1991	43.66	0.3343	217.12	597.5
1992	110.07	0.3424	194.43	738.6
1993	275.15	0.3254	211.99	969.3
1994	337.67	0.4359	516.20	1322.2
1995	375.21	0.4019	735.97	1667.8
1996	417.25	0.3555	1050.49	1952.6
1997	452.57	0.3622	1398.90	2166.5
1998	454.63	0.3427	1449.60	2315.4
1999	403.19	0.3643	1546.75	2460.1
2000	407.15	0.4390	1655.74	2721.8
2001	468.78	0.4335	2121.65	3008.2
2002	527.43	0.4903	2864.07	3301.1
2003	535.05	0.6004	4032.51	3726.1
2004	606.30	0.6980	6099.32	4386.0
2005	603.25	0.6386	8188.72	5044.1
2006	694.6	0.6685	10663.4	5784.9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7。

這些經濟上的變化一直都是被詮釋為中國綜合國力上升的重要指標，因此在這個國力上升的過程，中國政府與某一部分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國崛起」的議題。1995年5月，閻學通和王在邦針對「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的研究課題被選定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專案。1998年4月，閻學通、王在邦等4名學者的研究文章結集成《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評估》一書。2002年12月30日，「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訪問美國宣講類似觀點後，回到中國公開撰文建議，應該就「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展開研究。2003年11月3日，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講演，公開闡述「怎樣看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問題。緊接著，在2003年12月10日的哈佛大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發表了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正式提出了「以傳統文化為基底的中國和平崛起」。200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

談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又再次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此，「中國和平崛起」正式成為中國政府在新世紀之初的國家戰略。（閻學通 2005：148-149；《南方都市報》，2007/10/1）在這之後，中央電視台拍攝了12集《大國崛起》的電視影集，檢討了四百年來所有大國崛起的歷史，其中獨缺中國，「有為者亦若是」的箇中意義，不言而喻。

事實上，不止中國本身對「中國崛起」充滿懷抱，連西方右派與某些左派學者也因為不同的理由同樣地支持這一命題。在這篇論文中，我們要提出一個跟這些主流詮釋不同的分析進路，來估計中國崛起的真實處境。在第二節與第三節中，我們首先分析西方右派與左派關於「中國崛起」的論證。他們對此議題的解釋雖然不同，卻同樣存在著類似的東方主義式盲點，因而無法正面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對美國為主的全球市場之依賴。

第四節則分析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全球化因素，其實主要是指接受來自四小龍（特別是台灣與香港）的國外直接投資，因此1990年代後中國的「與世界接軌」其實是日益深入地改變改革開放前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策略，而被納入了雁飛型體系(flying geese system)中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也因此依賴於「美元循環」下的全球經濟體制。然而，由於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它的持續增長是不能建立在依賴世界市場的基礎之上，而必須依賴國內的消費能力。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內需市場的擴大是中國崛起的關鍵變數，而內需不足的困難既非新古典經濟學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不是「大中華經濟圈」的引入所能解決的。要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必須將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大地分配到低所得的農民與城市勞工手中，同時也必須加快全國性的社會安全網的建置，這些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深水區因此構成了中國是否崛起的關鍵變數。

二、西方右派的東方主義：自由市場機制

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何會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以至於成為論證「中國崛起」的堅實基礎呢？一個普遍被接受的說法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由於資訊傳輸技術的進步，生產要素（資本與勞動力）將因「要素價格均等化」¹的力量，更加地依據全球市場的資源有效配置來進行跨國流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順應了這個全球性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從進口替代工業化的錯誤政策轉為接受國外直接投資，帶來較進步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知識，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真正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利益，所以才有今日的成功。這個說法不但為國際多邊組織所宣揚，而且也是中國財經智囊所接受的說法。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開發組織）這個「富國俱樂部」就如此地描述中國的發展在全球資本主義階層體系上的「正確位置」：

普遍上我們都同意，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經濟與技術水準高於中國，而低於已開發國家。……因此，許多勞力密集的產業已經失去競爭力，而海外投資成為這些產業利用已累積起來的管理、技術與出口市場的一種手段。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勞力密集生產技術與穩固建立起來的國際出口市場十分適合來開發中國在勞力密集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以及提升中國的出口。(OECD 2002: 345)

因此，中國如果想要持續與提升其經濟發展，就應該更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制訂與國際規範一致的法規（特別是智慧財產權與併購方面），才能使數量更多、更為「優質」(higher quality)的國外直接投

1 「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的數學證明雖然頗為複雜，而且有著一些模型上的假設，例如：交易雙方有著相同的生產技術、規模報酬不變、資本與勞動力的轉換沒有交易成本等等，但是它所發揮的市場機能在直觀上卻不難理解。它是在說明，在同一個市場中，兩個相同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勞動力）由於自由競爭的關係，其價格將逐漸拉平而趨向相等。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自由的國際貿易中，兩國的生產要素會因為均等化的力量而發生流動，因此中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就會吸引著世界上相對豐沛的國外直接資本到中國投資，直到中國的勞動力與土地價格與投資國的價格相等為止。

資進入到中國：

有許多理由使已開發國家對中國保持著低度的國外直接投資，除了已開發國家與中國相對巨大的經濟與技術差距，以及遙遠的地理距離外，也有許多重要的因素阻礙著已開發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首先，已開發國家通常擁有先進許多的科技與生產技術，由於中國對智慧財產權薄弱的法律保護架構，使得他們不願意投資中國。第二，服務業在已開發國家是非常先進的，它是過去十年中，已開發國家的全球國外直接投資中成長率最高的部門，而中國的服務業是不對外開放的。第三，大型的跨國公司(MNEs)是已開發國家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承載者，而跨國併購則越來越是他們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然而，併購在中國是在非常嚴厲的限制下，以一種實驗性質的方式為之。(OECD 2002: 345-346)

OECD這種政策處方的邏輯與1980年代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行動邏輯是完全一致的（關於結構調整的分析請見底下）。論證的概念儘管十分精巧，但主要的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開放國內經濟，以中國的比較利益加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它的「潛台詞」其實就是，中國經濟更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是在遵守國際秩序下才有可能的。這種「比較利益」、「資源的有效配置」的新古典經濟學邏輯事實上也為中國菁英經濟學者所提倡。林毅夫就反覆論證道：

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較早的如歐美各國及近來的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其經濟發展都有著與採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國家截然相異的特徵。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能夠充分利用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因此，這樣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種充分利用比較資源優勢的戰略。（林毅夫 2004：6）

另外，在蔡昉、林毅夫所寫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國經濟》中，他們則明言地揭示，「本書是國內第一部以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全面闡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奇蹟的著作」（蔡昉、林毅夫 2003，使用指南）。作為一個反美國霸權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如此熱忱地擁抱「主流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這毋寧是令人十分驚異的發展轉折！

事實上，資本與技術的跨國流動從來不只是單純地依據市場邏輯在進行的，同時也是在一定的國際權力階層結構下運作的。全球化的經

濟運作與維持必須根植於一個穩定的國際政治與社會調節機制，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理論上就越需要一個全球性的治理架構來調節個別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Held 1999: 1-10)。即使是美國的現實主義者也公開論證，含藏在經濟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其實反映的是少數核心國家單邊影響力之結構性重組。²僅僅只談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有效性，而避開由「主流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權力階層與權力階層社會化的霸權分析，正好是那些「主流西方」的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希望「開發中國家」接受，並據以理解「開發中國家」為何居於邊陲位置，以及應該如何「改革」的論述。簡言之，運用以新古典經濟學來論述的全球化詮釋中國發展的軌跡，正是在塑造一種西方右派的東方主義。

三、西方左派的東方主義：大中華經濟圈

弔詭的是，對中國崛起這一命題的詮釋，除了西方右派的東方主義論述之外，還存在著一種西方左派的東方主義。對某些世界體系理論取向的學者而言，「中國崛起」被解釋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它不但標誌著預示著世界經濟重心即將轉移到東亞，而且這個崛起的東亞區域經濟是一種長久歷史秩序的復歸，回歸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

這個觀點宣稱類比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對地中海的分析，把自東北亞延伸到東南亞的海域中所包括的區域、國家與城市視為千年來具有獨特歷史，而以中國朝貢體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體系」。因為在這區域中的國家與城市其距離近到可以互相影響，但又遠到無

2 Gilpin就露骨地表示一種美國中心的全球化觀點：「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在欠缺一個強力而明智的領導架構下還能存活。這種國際領導架構應該要能提升國際合作，以建立並執行管制貿易、外資與國際金融事務的規則。……然而，自蘇聯的威脅結束後，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的支撐基礎已經遭到侵蝕。要確保全球經濟的存續，美國與其他主要強權必須再一次地承諾齊心合力，以重建已經被弱化的全球經濟之政治基礎」。(Gilpin 2000: 3-4, 13-14)

法互相兼併。這種自主性與關連性於是在政治上形成一種鬆散的整合，在經濟上則是以納貢系統為交換的網路，形成一個「必須以亞洲海洋史來理解的區域亞洲史」。（濱下武志 2003：20-60）

西洋勢力的入侵並沒有消滅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相反地，它們利用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作為媒介試圖把朝貢體系收為己用，也因此培育了海外華人商業網絡。依循同樣的邏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則被理解為日本帝國在創造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朝貢系統，以取代原先之中國朝貢系統。日本所遺留下來的朝貢系統則在戰後由美國所建立的雁飛型階層體系取而代之，建立了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冷戰朝貢系統。（阿里吉、許寶強、孔誥烽、塞爾登 2003：396-408）但是，原本以美日結盟為區域核心的雁飛型體系培植出來的四小龍，在後來轉而向中國輸出資本與技術，形成一個以海外華人為主的「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 circle*)。因此，台灣、香港，甚至於新加坡或東南亞華人對中國的投資可以解釋為由戰後美國霸權所培養出來的海外華人經濟網路，開始把資本引導到中國本土(*China proper*)，是一個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在歷史上的歷史復位(So and Chiu 1995: 27-28)。這種歷史趨勢「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一個一石兩鳥的有利武器：一方面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另一方面則依據一國兩制模式來進行國家統一」(So and Chiu 1995: 267-279; Arrighi and Silver 1999: 267-268)。中華民族的統一既可以抵抗核心國家的保護主義，又可以面對邊陲地區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So and Chiu 1995: 264-265)。簡言之，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首先被認為是東亞秩序的歷史常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的復興」則是對這種常態秩序的復歸，而中國崛起因此就是歷史的必然。

世界體系的理論進路強調大規模、長時間的分析，其優點在於發掘穩定性的結構性因素，但是大範圍地建構鉅型觀點，常常因為對實際細節缺乏準確的分析，以致於削歷史之足以適理論架構之履，呈現出一種體系決定一切的目的性論證(Skocpol 1994: 68)。也就是說，歷史事件的發展（如中國崛起）被認定為體系運動的結果（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在這樣的認定之下，符合事件發展的證據就會被強調，至於反面的證據或推論，通常就被忽略不計。例如，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濱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與塞爾登(Mark Selden)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的導言之中，也承認東亞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過程中會不時發生一些停滯或短暫的衰退，「但是，停滯與衰退不應該妨礙我們對這個根本趨勢的認識」（阿里吉、濱下武志、塞爾登 2003：2）。問題是，如果我們不對具體的經濟停滯或衝擊（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進行分析，我們又如何認識到什麼才是歷史的根本趨勢呢？

在這種左派的世界體系論述中，「東亞的復興」（或說中國的崛起）的主要的證據不外乎是本文一開始討論的四類數據（GDP、貿易量、FDI、外匯存底）之驚人成長。但是正如同我們將在底下進行的論證，這四類數量的增長是在「美元循環」的架構下才達成的，然而正是「美元循環」使得中國目前面臨著接濟結構調整的結構性難題。因此，儘管GDP、貿易量、FDI與外匯存底的成長一方面培植了中國崛起所需的資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帶來經濟結構轉型的巨大挑戰。如何評估其助益與問題需要更細密的解析，而是否存在一個根本的歷史趨勢，也在未定之天。

阿里吉等人把東亞的復興當成是中國崛起的前奏，其間的傳動機制則是overseas Chinese所建構的經濟網絡，這明顯的忽略了「overseas Chinese」這個詞彙所含藏的複雜族群與民族政治意義，因此其目的性論證的缺點就更加明顯。事實上在19世紀以前，居住於東南亞的漢族移民通常被稱為「華商」或「華工」。由於明、清兩朝的海禁政策，他們多半與當地人通婚，「經由通婚或是尋求官職以提高自己家庭的社會地位，他們最終都融入了當地的菁英社會中」（Wang 2000: 81）。只有當清朝為西方列強所迫，從「中央之國」(the middle-Kingdom)轉而重新界定自己為現代國際政治體系下的一個民族國家時，這些海外漢移民才開始被定義為「華僑」。他們開始被爭取成為清末改革或民國肇建的生力軍，也在戰後成為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競爭代表中國的正當性時爭取的對象。「華僑」的愛國形象與內涵也就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與轉折被一再界定。

然而，與此同時，戰後東南亞各國也紛紛從殖民地轉變成獨立的民族國家，國族建構的必要性使得東南亞國家對「華僑」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者特別地警戒，其結果是多數的華僑最終選擇歸化於當地國家。即使是以漢人為主的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之後，新加坡的漢人在英文中也可以用overseas Chinese自稱。overseas Chinese因此指涉的有可能是一個族群的身分，因此可稱為「海外華人」；也可能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中「中華民族」的成員，因此應該翻譯為「海外中國人」。把海外中國人、新加坡人、台灣人、香港人、甚至於在美國與日本的漢人都用overseas Chinese來指稱，並宣稱他們的歷史任務是在回復一個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這是典型的東方主義式論述，完全無力說明不同overseas Chinese群體間不同的身分認同，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計算，以及區域內因此潛藏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衝突。

四、全球化、美國霸權與中國的經濟增長

右派或左派對「中國崛起」的論述都立基於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假設，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中國的GDP會持續地以目前的速度成長，因此強大的物質力量將支撐同樣快速的軍事進展，從而對美國的東亞霸權構成嚴重挑戰。簡單地說，「全球化」主要指涉的是，生產要素超越民族國家的管制進行著金融、投資與貿易的跨國流動與整合，以致於產生了個別國家所無法控制的經濟整合現象。中國由於提供全球要素市場廣大而廉價的勞力與土地，從而吸引全球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在幾個關鍵點上促進了中國的發展。第一、投入中國的國外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的出口，長期的貿易順差累積了鉅額的外匯存底，提供了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財政與金融能力。第二、國外直接投資幫助中國建立了勞力密集產業，吸收了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下崗工人與農村剩餘勞動力。第三、由於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勞力密集產業所累積的技術與資金可以進一步提升其產業技術。三者共同促進了中國在1990年代以來的巨大發展。

蔡宏政(2007)已針對前述中國崛起的三個關鍵點論證道，第一、

FDI的流動遠非全球均質化，而是集中在已開發國家之中的。中國所大量吸收的FDI主要是來自東亞四小龍（特別是香港與台灣）的出口導向投資。第二、由於接受的是東亞雁飛型國家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產業，因此相對於國內消費能力而言，中國的產能是過剩的，它具體表現在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國經常帳的急速擴大，以及日本、四小龍與中國大量的貿易順差。第三、雁飛型國家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技術源頭是美國與日本，中國經由接受四小龍的出口導向勞力密集產業而融入全球經濟，使得中國的產業技術被納入此一體系之中。

第一點是關於美元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體制，第二點是貿易市場的對美依賴，第三點則是以美日為核心的東亞產業技術階層控制。在這三點上，除了經濟體規模外（這是關鍵性的重點，詳後述），中國目前的發展都表現出與雁飛型國家類似的特徵，也就是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遵守美元本位的國際金融體制，以及對美國的貿易與技術依賴為代價。因此對「中國崛起」的討論必須超越「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全球化，而進一步解析以美國霸權為主的全球經濟體制轉型下，中國的經濟力增長如何擺脫對美國依賴，以及因此可能必須面對的問題。

因此，在本節中我們首先要分析美國霸權在形塑東亞區域主義的轉變過程；其次再討論中國的發展如何鑲嵌入這一區域結構的轉變。如此才能正確重估中國的外資、貿易順差與外匯的驚人增長，其真確的意涵為何，並由此鎖定中國未來持續增長的關鍵性問題：內需不足。我們分析，內需不足的根本解決是要求中國政府必須進行更深入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它們既無法藉由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來解決，也無法如前述的左派學者所描繪的，通過「大中華經濟圈」的建立就可以克服。

（一）全球化與東亞區域化的轉型

在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經濟全球化有一個主要的特徵，那就是生產的全球化。幾乎沒有一項商品是從頭到尾在單一國家中完成的，也幾乎沒有幾個國家能置身於全球產業分工的網絡之外。這種變化主要

胎動於1980年代，而在1990年代成為世界的潮流。在1980年代初期，國際金融面臨了美元本位的危機，這一危機直接造成了拉丁美洲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策略被全面性地「結構調整」為「出口導向工業化」，而東亞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則被高舉為「奇蹟」，一個全球性的貿易與投資流動網絡從那時開始日益上升，成為今日我們所謂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必須從美元本位的危機下手。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金融體系的重建主要的課題是如何在國家發展和穩定世界金融秩序之間尋求一個穩定的平衡，這就是戰後一直到1971年間一個具有穩定性的美元—黃金比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被創制的理由。布列頓森林體系開啓了一個美元等同黃金，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系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二組織則被建立來維持國際金融貨幣秩序、個別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維持國家長期發展所需的資金融通。

這個以美元為支柱，支撐戰後全球經濟高度成長的國際金融體系當然不是一種憑空的創制。美國在1947年擁有全球貨幣黃金存量的70%(Walters and Blake 1992: 73)，因此，戰後全球經濟要持續運轉必須有賴於美國黃金以美元的方式持續地輸出。所以，即使美國在1945年占有全球經濟輸出總值的三分之一，美國仍然需要保持國際收支赤字以便輸出全球經濟運轉所需要的資本(Rapley 1996: 35)。這種特殊的資本輸出能量再加上遙遙領先的工業製造能力共同支撐了美國在戰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構中的干預能力。

整個布列頓森林體系雖然維持了國際金融穩定與國家發展的平衡，然而這個體系的運作卻必須立基於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這明顯地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理論上來講，只要世界各國繼續保持對美元的信心，那麼布列頓森林體系的黃金—美元本位就可以持續運作。但是實際上由於美國發行的美元數量日益增加，以致於在1971年海外美元的數目已經超過美國黃金存量的300%(Walters and Blake 1992: 75)。這意味著只要少數國家握有三分之一的美元就足以換取美國所有的黃金儲備。為了維持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自主性，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x Nixon)遂於1971年宣布切斷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

在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被切斷之後，國際金融從此進入浮動匯率的時代，理論上，美元只是所有國家貨幣中的一種，其價值視與其他各國貨幣的匯兌比例而定。然而，美國在國際上的政治與軍事支配地位繼續支撐了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尤其甚者，美元因為切斷了與黃金的兌換關係而更可以不受拘束地印製，因此1971年之後，國際金融與貿易體系實際上是進入一個美元本位體制。這一體制最重要的特徵是容許美國以更自由的方式印製美元來進口貿易伙伴的商品，而美元則取代黃金成為各國主要的外匯儲備。美國的金融帳盈餘（也就是反映其經常帳赤字的規模）在1970年代之後開始穩定上升，而在1983年開始飆漲，1987年達於戰後的首波高峰。之後的規模雖然縮小到僅為92億美元，但是從此之後則以令人矚目的速度飆漲到2004年的6126.9億美元（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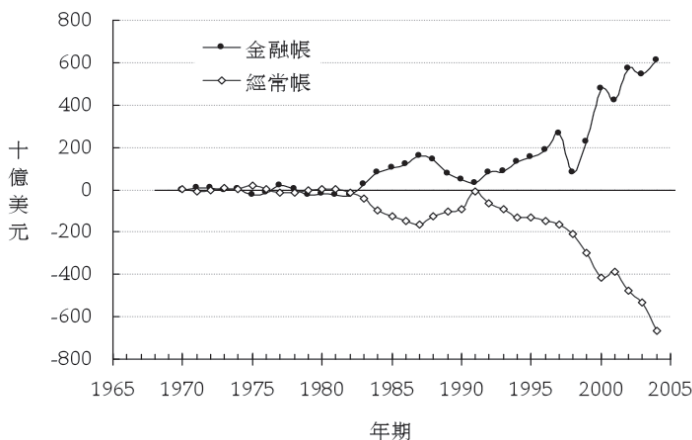


圖1：美國的金融帳與經常帳

資料來源：1997年以前的數據來自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8, pp. 894-895。1998年以後的數據來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 pp. 602-603。

隨著美國的金融帳盈餘的飆漲，全球的國際儲備也同步上升。從1987年到1999年全球的國際儲備成長了13倍，到2004年時，漲幅已經達到1969年的63.7倍！全球儲備的巨幅上升是美國不斷輸出美元的直

接結果，美元的輸出使得美國得以用信用賒欠的方式使用了遠超過其國內生產力的全球物資，提供維持美國全球性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的物質基礎，而美國的購買力則成為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主力。美元的升貶與輸出入因此成為左右全球金融與產業結構重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美國債務在1980年代初期的急遽增加（圖1），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並吸收外資來降低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在1980年代中期美國透過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利率提高，來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Arrighi 1994: 370, figure 20）。這政策對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汲取了那些被邊陲國家用來繼續發展的資金；另一方面，美國樹立的高利率水準導致償債成本超過了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償還能力。

因此，核心國家面對金融危機的因應手段使得許多拉丁美洲的半邊陲和邊陲國家陷入債務陷阱中。負債國家持續地增加債務且無力如期償付他們的欠債，推翻了國家不會破產的神話。於是，戰後以援助國家發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歷經1970年代的頹勢之後，在1980年代又重整旗鼓，以國際金融秩序管理者的身分呈現。透過多邊組織借貸，布列頓森林體系機構對拉丁美洲國家執行他們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jects, SAPs），強調出口帶動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和匯率改革），改進國內資本構成（稅款和金融改革），以及減少政府干預（Gwynne and Kay 1999: 78）。東亞國家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則在此時被高舉為「經濟奇蹟」，配合遠程通訊技術的發展，一個全球性的貿易與投資流動網絡遂日益上升，成為今日我們所謂的全球化。

美元本位的危機處理所導致的全球化要求各國在貿易、投資的跨國流動上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然而由於不同的區域條件，它對東亞所造成的區域整合效果與拉丁美洲並不相同。東亞與拉丁美洲在發展上最大的差異是，東亞中的日本與四小龍，由於其地緣政治的關係，在美元—金本位時期就因為美國「邀請下的發展」，得以藉由對美貿易順差累積大量的美元。相對於拉美國家，日本與四小龍的金融

優勢使得它們在全球金融轉向美元本位時，有較強的因應能力來適應1980年代國際上美元供給的波動。

東亞出口導向工業化是在戰後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下的地緣政治結構被形塑出來的。美國東亞戰略的最初目標是在解構日本軍國主義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因此在整套的重建計畫中最主要的目標是拆除支持戰爭的財務引擎——日本財閥集團，民主化日本政治體系，以及改革日本的軍事文化。然而在1947到1948年間所逐漸出現的冷戰對峙急遽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畫中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社會政治改革，而是東亞的區域權力平衡。作為東亞在戰前唯一的工業國家，而且具備大東亞共榮圈所建立起來的殖民地網絡，日本因此成為「亞洲馬歇爾計畫」(Asian Marshall Plan)的首選結盟者藉以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日本重建計畫的原先方向整個被逆轉。戰前的財閥集團被重新組織起來，財經技術官僚與政治菁英也繼續被保留在戰後的權力階層中。(Selden 1997: 309)透過韓戰的軍需採購，美元被大量地輸入日本以及東亞其他國家。日本則透過戰前殖民地網絡，自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取得農工原料並回輸工業製品以平衡其美元短缺。美國則經由開放國內市場，吸收東亞反共國家日漸復興的生產能力，將美元在韓戰、越戰之後，以貿易順差的方式持續地輸入這些盟國。

二次大戰以前，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以分析日本的紡織業與機械工業為例來說明，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由後進國轉變為先進國，將會經歷輸入資本財、建立國內工業、到有能力出口原先必須進口的商品等階段。每一個產業部門的比較利益將會隨著時間由低而達到最高點後下降，從而進行產業轉換，形成一種倒V字型的排列，就像雁群飛翔的隊伍一般。這個雁行理論在戰後與美國學者弗農(Raymond Vernon)用來解釋生產的跨國流動所提出的產品週期理論(product life-cycle theory)相結合，被進一步地建構成根據「比較利益法則」理性而且互惠地形成的區域分工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日本由於其資本與科技的優越性成為產品創新的區域源頭，不言而喻地也就攫取商品鏈(commodity chains)中附加價值最

高的一部分。根據資本與技術密集程度及附加價值的獲取能力，日本依次將生產技術以國外直接投資傳給第二梯隊的台灣、韓國、新加坡與香港，第三梯隊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後來第四梯隊的中國與越南。因此，一個「理念型」的雁飛型發展都是圍繞在以日本為首垂直整合的區域製造網絡，以確保日本在東亞地區發展上的領導權。

因此，如果我們說日本是領導東亞國際生產基地的雁頭的話，那麼整個雁群的飛行方向則是由美國的購買力來指揮的。沒有美國的市場，再怎麼有效率的東亞彈性生產組織或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都無法完成一個完整的資本循環以產生資本積累。在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改變區域分工之前，伴隨著美國金融帳的大幅上升的是日本與四小龍的對美出口也逐漸提高，最高達到35%到40%之間，廣場協定之後這個比例則再現於東亞各國與中國身上。（蔡宏政 2007）

（二）中國崛起與美國市場的依賴

東亞的「出口帶動成長」模式依賴於對美國的大量出超，這些出超國持有大量的美元儲備會在該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匯兌，轉化為本國貨幣進入該國，由此產生了兩個相互依存現象，第一是各國央行持有的美元外匯要求一個適當的再投資管道，以確保其價值與盈利。在安全性與流動性的考量下，現實的情況是持有大量美元外匯的國家大多選擇購買美國的公債、公司債或股票，美國就以這鉅額的金融帳收入來融資貿易與預算赤字，繼續維持其購買力。第二，在採取固定匯率的情況下，當美元儲備進行匯兌，轉化為某一國家的貨幣而進入該國時，它就造成該國的貨幣供給上升，其作用一如該國央行所注入的強力貨幣(high power money)，將會在銀行體系中不斷的借支與儲存中產生信用創造的效果，從而提高該國的投資強度，當外匯流入的速度非常快的時候，就會發生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的現象。³過剩的產能更

3 當然，央行可以發行國債將多餘的貨幣吸收進來，但是如果牽涉的金額過於龐大或儲備資產增加過於快速，則發行國債所必須支付的利息代價可能就會太高而變得不可行。另外，央行也可以拋售美元以吸收本國貨幣，但是如此一來就會造成本國幣值的上升，對出口帶動成長的國家而言，這是極力避免的選擇。

加依賴美國的購買力來吸收，因此也就加強了出超國對美國融資的必要性。換言之，美國以不斷印製的美元交換對美出超國源源輸入的商品，而這些輸出的美元又有一大部分回流到美國，用以支撐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購買力，美國由於其獨特的金融地位，得以用賒借的方式使用著全球的資源。

這個「美元循環」的過程是以美國不斷高築的債務為動力，因此最終而言這一循環一定會遇到美元發行過多所導致的美元貶值與美國清償能力問題。每一次的美元貶值調整就會導致主要貿易伙伴幣值上升與對美出口的下降，此時，這些依賴對美出超帶動成長的國家就必須加強其資本輸出，以及尋求其它的出口市場。美國的金融帳盈餘在1983年開始飆漲，在1987年達於戰後的首波高峰，大量的債務使得當時的雷根政府不得不對主要貿易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的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希望因此加強美國的出口能力，從而削減赤字，美國總體經濟政策的改變具體地表現在「廣場協定」上。

1985年9月，在美國的策劃下，7大工業國中的美、英、德、法、義5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簽訂「廣場協定」。以日本為首，東亞四小龍的幣值在1980年代下半葉開始大幅上升，並且在1995年以前維持著這波升值的幅度。相對地，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3年，中國決定維持經濟開放的路線，持續地以吸收外資、擴大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因此在1990年代上半葉也快速地貶值。因此，美國支配下的「美元循環」所積累的結構性美元貶值壓力導致了區域匯率的重新調整，而這種區域匯率調整帶來的對美出超國的升值壓力才以「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機制拉動了區域內的產業分工與貿易結構的轉型。

四小龍（香港除外⁴）的出口利潤因幣值上升被壓縮，使得勞力密集生產部門必須移往國外，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留在國內的產業

4 香港匯率是釘住美元，所以在這段期間相對於日本與其他小龍的貨幣其實是貶值的，但是由於人民幣在1990年代初期的大幅貶值，加上香港與中國長期特殊的經濟地緣關係，香港的對中投資與其他各國呈現類似的變化，而且投資幅度更大。

則必須進行產業升級，也就是往更高附加價值的生產工序移動。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開始加強對四小龍的資本輸出，在1990年代之後則轉向東南亞及中國。⁵四小龍則在稍後，也就是1991到1993年之間開始提高他們對中國的投資。由於這種FDI的成因一開始是第一與第二梯隊的雁子們的勞力密集產業無法承受升值所帶來的成本上升而尋求海外生產基地，因此這種投資遂帶動了被投資國對投資國原物料與資本財的需求，導致了亞洲區域內貿易額的增加，表現為某些學者強調的亞洲經濟區域化(regionalization)(Kwan 1994)，這也正是1992年鉅量FDI開始湧入中國的「全球化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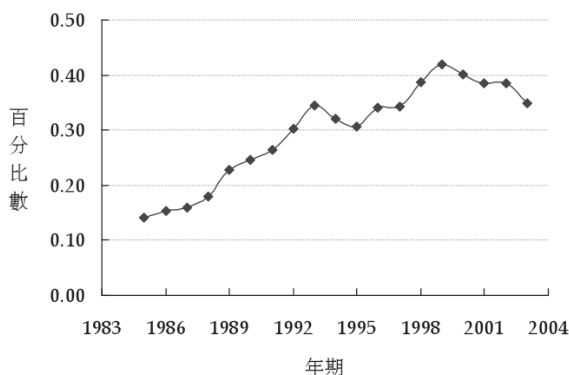


圖2：中國對美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例，1985-200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3；U.S. Census Bureau, 1985-2003。

雁行秩序的轉型使得日本與四小龍對東南亞與中國輸出FDI，它在造成前者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下降的同時，也提高了後者對美出口的依賴。根據美國自己的統計規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額在1999年達於42%的高峰，迄2004年仍達於三分之一（圖2）。⁶如果

5 即使如此，我們需注意的是，超過60%的日本對外投資仍然是集中在美國及歐洲。

6 在此，「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有部分包括了香港對美出口，其理由是以香港的經濟規模並不足以完全吸收中國對香港的出口，請見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06>。

說中國的經濟成長來自外資與出口，那麼FDI與貿易順差的累積就是中國成長的關鍵，「出口帶動成長」也的確引導了中國在1990年代以來的傲人成長，並進而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然而「出口帶動成長」能否持續下去，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必須視美國市場的購買力而定。也因此，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會同樣面臨雁行秩序的國家過去所遭遇的基本難題：「美元循環」所產生的衝擊。

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展開，外匯儲備不斷節節升高，它一方面造成中國國內貨幣供給的上升與過度投資，另一方面卻積蓄了美元對人民幣的貶值力量。「出口帶動成長」使得中國產能的提高需要美國更高的購買力，但是美國的購買力卻在金融帳的節節升高下趨於疲乏，⁷這兩種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導致了中國可能面臨的產能過剩危機。

產能過剩就是市場上的購買力不足以完全消費投資所生產出來的商品，因此如果一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投資除以消費是呈現節節上升的趨勢，那麼，我們可以說，該經濟體正逐漸地累積著產能過剩的壓力。底下我們就以中國歷年來的固定資本形成除以消費來觀察中國是否有產能過剩的跡象。我們首先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國內居民消費，可以得到明顯逐漸上升的趨勢。其次，我們再加上政府消費，也就是固定資本形成除以國內總消費，其結果依然得到一個上升的趨勢。只有當我們將固定資本形成除以國內總消費以及出口時，中國的產能才得到平衡。（圖3）換言之，中國的產能釋放主要一直都是依靠國際市場的消費來實現其資本循環，而其中又以美國市場占最大份額，也就是說，在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要依賴世界市場，而世界市

7 美國的經常帳赤字雖然在1986-1990年因為廣場協定的簽署而縮小，但是在1990年以後則開始另一波規模更大的赤字成長，每年的債務以GDP的4%到5%的速度往上堆疊，也就是約等於每小時發行5,000萬的紙幣交換各國對美輸出的產品(Duncan 2004: 71-73)，根據WTO的統計，2004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已達於6680.8億美元，約等於每小時發行7,600多萬的紙幣交換各國對美輸出的產品。請參見WTO網站：<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US>。從「美元循環」的反覆呈現貶值的趨勢來看，美國的主要貿易順差國，特別是中國，勢必又要面對美國要求他們升高幣值的壓力。

場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持續的消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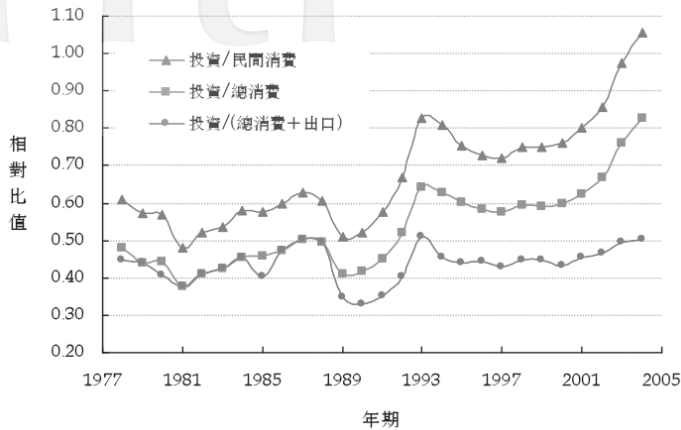


圖3：投資與消費的關係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5。

五、結論

從1992年之後，中國的GDP除了持續1980年代以來的增長外，國外直接投資如坐直昇機般的上升，貿易順差與外匯也相應地快速增長，這四類數據的高速成長引發了關於「中國崛起」的熱切討論。西方右派學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本文以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為例）來解釋，中國之所以崛起乃是因為遵守了「比較利益」發展法則，因此，中國未來的崛起必須進一步地開放其經濟，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體系整合。這一解釋在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被廣為接受，構成本文所謂的「西方右派的東方主義」。另一方面，以世界體系為主的西方左派學者則把「大中華經濟圈」解釋為中國傳統納貢體系的歷史延伸，從而認為「中國崛起」乃是歷史長期趨勢的復歸，體現了一個有別於歐洲中心世界體系的東亞世界體系，它構成了本文所謂的「西方左派的東方主義」。

左右兩派的解釋雖然不同，卻同樣有著各自的東方主義式盲點，

因為它們都無法正面分析，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對美國為主的全球市場之依賴。造成這種依賴的原因是中國的外資主要是來自四小龍（特別是台灣與香港），因此1990年代後中國的「與世界接軌」其實是日益深入地改變中國原先「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而被納入了雁飛型體系中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國家發展依賴於對美出超，也因此依賴於「美元循環」下的全球經濟體制。然而與四小龍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規模遠勝過日本與四小龍之總和，因此，對美出超的出口導向成長造成中國舉世無匹的外匯存底，它與美國的貿易赤字是一體的兩面，共同構成IMF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換言之，與四小龍不同，中國由於它的巨大經濟規模，所以它的長期發展是不能建立在依賴世界市場的。

因此，中國經濟長期的持續增長終究必須依賴國內市場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必須趕上投資生產能力，從而扭轉因為「出口導向工業化」中生產過剩的問題。然而問題是，「出口導向工業化」一方面造成國內的消費不足，另一方面則導致經濟發展集中在沿海大都市中。在缺乏全國性社會安全制度的情況下，依賴市場邏輯來分配福利的「改革開放」只會更加制約了占人口多數的農民與城市職工之消費能力。

內需市場的擴大因此是中國崛起的關鍵變數，而內需不足的困難既非新古典經濟學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不是「大中華經濟圈」的引入所能解決的，事實上，這個問題正是透過「大中華經濟圈」與世界經濟接軌造成的。它的根本性解決在於逐漸地逆轉原先出口導向成長的模式，適度升值人民幣，降低貿易順差，加重國內市場在推動經濟增長上的份量。要達到這一目的，中國政府必須將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大地分配到低所得的農民與城市勞工手中，⁸同時也必須加快全國性的社會安全網的建置，這些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深水區才是中國是否崛起的關鍵變數。

8 從這點來說，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的確具有「中國崛起」的戰略性意義。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中國國家統計局。1984-2007各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許寶強、孔誥烽、塞爾登(Mark Selden)。2003。〈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與西方〉，收錄於《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50年為視角》，阿里吉、濱下武志、塞爾登合編，頁332-42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阿里吉、濱下武志、塞爾登。2003。〈導言：從地區與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理解東亞的復興〉，收錄於《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50年為視角》，阿里吉、濱下武志、塞爾登合編，頁1-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尚曉援。2007。《中國社會保護體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林毅夫。2004。《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書生。2006。《社會保障改革：何去何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蔡宏政。2007。〈全球化、區域整合與中國崛起的條件〉，刊於《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5(2)：13-59。

蔡昉、林毅夫。2003。《中國經濟》。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閻學通、孫學峰。2005。《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濱下武志。2003。〈朝貢和條約〉，收錄於《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50年為視角》，阿里吉、濱下武志、塞爾登合編，頁20-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英文書目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Verso.

- Gilpin, Robert. 2000.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wynne, Robert N. and Cristobal Kay. 1999. *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Arnold.
- Held, Davi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ward a Yen Block*. New York: Routledge
- OECD.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OECD Publications.
- Rapley, John. 1996.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elden, Mark. 1997. "China, Japan, and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1945-1995,"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pp.306-34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4.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So, Alvin Y.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5.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 Walters, Robert S. and David H. Blake. 1992.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Wang, Gungwu.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資料

- 《南方都市報》。2007/10/13。〈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崛起〉。南方報業網。<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d/dsb/A08/200710130029.asp>。(2008/3/6瀏覽)